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如前所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北京、上海與廣東為例，探討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差異的決定因素。因此，本章之文獻回顧主要分為三部分來探討：首先，在第一節中分析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即外商直接投資理論。接下來，在第二節中回顧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之相關文獻，而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差異的決定因素之相關文獻則在第三節中加以敘述。最後，本章將於第四節中統合上述三部分，進行本章之小結，並探討所回顧文獻和本文之關係。

第一節 外商直接投資理論

一、壟斷優勢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初步起源於 Hymer (1960)。1960 年 Hymer 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這項研究被譽為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開山之作。他的論文發表之後，經由其導師 C. P. Kindleberger 等學者的補充，發展成為完整的理論，這個理論被稱為壟斷優勢理論，也被稱為海默—金德爾伯格傳統 (H-K tradition)。

Hymer (1976) 的壟斷優勢理論主張，企業的壟斷優勢和國內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這個理論也主張，如果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行，則國際直接投資就不能發展，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市場的失靈則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由於商品特異、商標、特殊的行銷技能或價格聯盟等原因造成的產品市場失靈；由於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失靈；由於政府的有關稅收、關稅、利率和匯率等

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場失靈；由於特殊的管理技能及受專利制度保護的技術差異等原因造成的要素市場失靈。上述不同類型的市場失靈使跨國公司擁有壟斷優勢，這種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跨越國界到海外建立子公司，是由於它擁有某種壟斷優勢，因而可獲得比國內市場高且超過投資國當地競爭者的收入。一般來說，跨國公司擁有以下的壟斷優勢：擁有先進技術是跨國公司最重要的壟斷優勢。大型跨國公司擁有極強的研究能力，並投入鉅額資金開發新技術，在長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發展出一整套適應現代化生產的先進管理經驗，可對生產經營活動實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跨國公司利用國際專業化的生產，避免本國和投資國市場對規模經濟的限制，一般而言，企業生產規模越大，越具有規模經濟優勢，跨國公司利用各國生產要素的差異，並使之轉化為公司內部的利潤；大型跨國公司擁有先進的通訊設備，分支機構遍布世界各地，資訊靈通；大型跨國公司具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公司總部可以在公司內部的各子公司之間靈活調度數額龐大的資金，這是一般國內企業無法比較的優勢；大型跨國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行銷系統，且與國際流通公司有長期合作關係，在銷售成本與便捷性上享有優勢。

二、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Vernon (1966) 提出了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The Product Life Cycle Model)。Vernon (1966) 認為，壟斷優勢理論的理論分析還僅僅停留在靜態的階段，不足以說明企業在國內生產、出口海外和國際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而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將企業的壟斷優勢和市場行銷產品的壽命週期⁶結合起來，從動態的角度考察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爲。

⁶在行銷學中，一般將產品從進入市場到退出市場的全過程分為：引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等四個不同階段。

在國際供需平衡的假設前提下，Vernon（1966）依據產業從工業發達國家到後發展工業國家，再到開發國家的順次轉移現象，將產品生產劃分為導入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導入期為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發達國家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國內市場順利開拓，並開始向後發展工業國家出口，逐漸擴大國際市場的佔有率。成熟期為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隨著技術的普及，原進口國亦能生產同類產品，這時就會出現大量的跨國投資和技術輸出。標準化期為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由於產品的標準化，國外生產成本大大降低，產品出現逆流現象，工業發達國家逐漸放棄該產品而轉向開發更新的產品，從而再度開始產品生命週期的輪迴。

這個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說明，企業從事跨國直接投資活動是遵循產品生命週期的一個必然步驟。該理論對二次大戰後，西方已發展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給予了有效的解釋。由於準確地描述了戰後跨國公司的一般投資過程，Vernon（1966）的模型在理論界風行了相當的一段時期。後來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中，特別地強調了跨國公司的寡占行為，並將跨國公司的寡占行為與產品生命週期的三個階段結合起來，對跨國公司隨產品生命週期變化而變化的經營決策行為，給予了更加細緻的描述和分析。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雖然能夠較明確地解釋戰後美國公司對外投資行為，並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形成過程，但是也存在著許多侷限性。首先，該理論不能解釋企業直接在國外開發新產品，並跨國生產的現象。其次，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加速，許多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並不遵循Vernon（1966）三階段的規律，其中突出的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投資迅速增長，這一趨勢是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無法解釋的。

三、投資發展階段理論

以上我們提到的壟斷優勢理論以及產品生命週期理論，都是從已開發國家的角度出發，研究這些國家的企業向海外投資的過程，但無法解釋發展中國家向外直接投資的現象。為了彌補這一缺陷，Dunning（1993）提出了投資發展階段理論，用一國的每人平均直接投資流出量（ODI），每人平均直接投資流入量（IDI），每人平均直接投資淨流出量（NODI），表示該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水準，然後用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GNP）表示該國的經濟發展水準，然後對 67 個國家在 1967 年到 1978 年間的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水準的資料進行相關的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可以把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四個階段，且對外直接投資週期的四個階段呈現出以下的趨勢：伴隨著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平均直接投資淨流出量也不斷增加，從而證明了資本流動和國民生產總值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性。關於這四個階段的詳細說明如下。

處於第一階段的國家，每人平均 GNP 在不高於 400 美元時，較少吸收外資，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淨對外投資額為零或較小的負數額。處於這一階段的國家大多是最貧窮的國家，本國經濟落後、技術力量薄弱。這些國家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該國的企業沒有所有權優勢。之所以有較少的外資進入，則主要是因為國內缺乏讓投資國滿意的區位優勢。

處於第二階段的國家，每人平均 GNP 介於 400 到 1,500 美元之間，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國內市場有所擴大、投資環境有較大改善，因而區位優勢較強，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迅速增加。但由於這些國家的企業優勢仍然十分有限，對外直接投資仍然相對處於少額的狀態，淨國際直接投資流量為負值。

進入第三階段的國家，每人平均 GNP 介於 2,000 到 4,750 美元之間，大多數新興工業化國家處於這一階段，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正在穩定發展，資本流出快於資本流入，雖然資本流出的淨值仍是負的，但缺口逐漸縮小。在這一階段，國內經濟發展水準漸漸提高，使國內企業逐漸優勢，而原來的外國投資者的優勢則逐漸消失。

處於第四階段的國家，每人平均 GNP 超過 5,000 美元，進入這一階段的國家主要是已開發國家。這些國家成為淨對外投資國，也就是對外投資總額大於吸收外資總額，這反映了這些國家企業具有強大的優勢，或者正逐漸削弱外國企業在本國的區位優勢，對外投資規模日益擴大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隨著經濟發展，致使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而積極尋求海外廉價勞動力，以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或者由於外國對該國大量出口，導致的貿易壁壘日益增加，為了減少貿易摩擦，而在商品銷售國投資設廠，在地生產製造。

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將一國的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能力與經濟發展程度結合起來，認為一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與每人平均 GNP 成正比關係。該理論動態地描述了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動態關係，也可以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過程。從歷史發展來看，世界上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投資地位的變化大體上符合這一發展趨勢。

第二節 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之相關文獻

在研究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方面，相關文獻多以中國各年各地區為樣本，研究中國各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而大多數的研究都參考前述各項外商直接投資理論，採用綜合各理論的方式，分析外商進入中國的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

在中國各年各地區樣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Head and Ries (1996) 以有條件 logit 模型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LM) 研究外商赴中國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觀察樣本為 931 家外資企業的個體資料，結果發現完善的基礎建設對吸引外資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果，而工資水準對吸引外資則為負面影響但效果不顯著。此外，Head and Ries (1996) 以地區的外資企業數做為群聚效果 (agglomeration effect) 的衡量指標，得到的結果發現，一個地區的外資企業越多，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亦即存在有正的群聚效果，且該效果相當顯著。而 Chen (1996) 同樣以有條件 logit 模型，將中國分為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地區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市場大小與吸引外資間為正向關係，但僅有中部地區顯著；工資率對吸引外資間有負向關係，惟三大地區皆不顯著。在基礎建設方面，以鐵路密度做為衡量指標，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正面效果，但僅有東部與中部地區顯著。

Cheng and Kwan (2000) 以動態追蹤資料迴歸模型 (dynamic panel regression model)，以一般化動差法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估計，分析在 1985 年到 1995 年間，影響中國 29 個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其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區域若有較大的市場、良好的基礎建設、以及優惠政策會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有正面的影響，但高工資則會有負面的影響，且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有正面顯著的群聚效果。而 Coughlin and Segev (2000) 為了驗證中國的一個省或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

資的數量，是否會受鄰近的省或地區所影響，採用了空間相依（spatial dependence）的假設進行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分析，其研究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具有外溢效果。此外，亦發現一個省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其市場大小、平均生產力、以及臨海與否與呈正向關係，而與其平均工資與文盲率成負向關係。

Hsiao and Gastañaga（2001）使用 1970 年至 1995 年間的資料，分析影響中國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經由 OLS 的估計和區域間資料的比較，該研究結論出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及其成長率、基礎建設、有技能勞工的比率以及政府行政效率，是造成中國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少於沿海地區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不同的時期鑑於不同的時空環境，造成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亦不相同。Sun et al.（2002）以 1986 年到 1998 年間中國的 30 個省市地區為樣本，用固定效果的追蹤資料模型，分析各省市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其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會隨時間而變動，例如勞工素質、基礎建設、政治的穩定情況、及開放程度，都是吸引外商前往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但在 1991 年前後各省市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因素並不相同。此外，該研究也得到沿海省分較中西部省分更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結論。若以歷年外商直接投資累積金額占中國累積投資的比率做為解釋變數，亦支持群聚效果的假設，但該效果卻為負面顯著。

以上列舉之文獻，皆由中國各省市地區投資環境的比較著手，並探討出許多一致性的結果。然而，也有部分學者由中國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比較切入，並得到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不一致之結論。Kuo and Huang（2003）從區域的觀點切入，採用固定效果的動態追蹤資料模型，解釋 1996 年至 2000 年中國 28 個省市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在將中國分為沿海與內陸兩大地區進行比較後，研究結果顯

示，平均工資對沿海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內陸地區，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及代表開放程度的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則對其外商直接投資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林俊儒（2003）在其碩士論文中，透過一般最小平方法（OLS），將中國分為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區以進行估計。其研究結果顯示，東部地區係以市場區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並具有較高的固定效果；而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例如，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地方基礎建設等。因此，兩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完全不同。

陳哲正（2003）針對台商研究中較為欠缺的區位選擇行為，以有條件logit模型架構出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個體選擇模型，並以更細化的產業別分類探討各區域條件的影響效果，最後再透過訪談的過程，針對實證的結果加以再驗證，得到完整以區位條件為觀點所架構出的台商製造業區位選擇模式。研究發現，台商還是延續了過去在台灣的生產模式，凸顯了台商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重視聚集的特性。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的集中度、國家高新政策上，則因產業別的不同而產生出較大的歧異。訪談的結果也顯示出勞力條件的影響將會在未來日漸弱化，這種趨勢是和生產要素的移動性息息相關。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已注意到市場潛力的需求，也成為近年來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轉變。

表 2：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之相關文獻

作者	研究對象及範圍	研究方法	重要結論
Head and Ries (1996)	1984 年至 1991 年外商赴中國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觀察樣本為 931 家外資企業的個體資料	有條件 logit 模型	完善的基礎建設對吸引外資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果，投資地區存在有顯著、正面的群聚效果。
Chen (1996)	將中國分為東部、中部與西部三大地區進行，分析 1987 年至 1991 年外商赴中國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	有條件 logit 模型	市場大小與吸引外資間為正向關係，但僅有中部地區顯著。基礎建設完善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正面效果，但僅有東部與中部地區顯著。
Cheng and Kwan (2000)	1985 年到 1995 年間，影響中國 29 個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	動態追蹤資料迴歸模型	基礎建設、市場大小，以及工資率會顯著地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決策，且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有正面顯著的群聚效果。
Coughlin and Segev (2000)	1990 年至 1997 年影響中國 29 個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	普通最小平方方法	外商直接投資具有外溢效果。外商直接投資與其市場大小、平均生產力、以及臨海與否與呈正向關係；而與其平均工資與文盲率成負向關係。
Hsiao and Gastañaga (2001)	以 1970 年至 1995 年間的資料，分析影響中國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	普通最小平方方法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及其成長率、基礎建設、有技能勞工的比率以及政府行政效率，是造成中國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少於沿海地區的主要因素。
Sun et al. (2002)	1986 年到 1998 年間中國的 30 個省市地區為樣本	固定效果模型	1991 年前後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因素並不相同。沿海省份較中西部省份更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且存在有負面顯著的群聚效果。
Kuo and Huang (2003)	1996 年至 2000 年中國 28 個省市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	固定效果的動態追蹤資料模型	平均工資對沿海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內陸地區，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及代表開放程度的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則對其外商直接投資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林俊儒 (2003)	將中國分為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區以 1992 年至 2001 年之追蹤資料進行估計	一般化最小平方方法	東部地區係以市場區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並具有較高的固定效果；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特質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例如，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地方基礎建設等。因此，兩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完全不同。
陳哲正 (2003)	1999 年至 2001 年中國 19 個台商投資的地區資料	有條件 logit 模型、訪談調查	台商對於中國的投資重視聚集的特性。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的集中度、國家高新政策上，則因產業別的不同產生較大的歧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文獻依年份排序順序。

第三節 世界各國投資中國之相關文獻

至於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為何會捨棄母國的投資環境，而逕赴中國進行外商直接投資，其相關文獻也是近年來所熱烈討論的。以資料的型態作區分，目前文獻中使用時間序列資料(Time Series Data)分析的有 Wang and Swain (1995) 以及 Zhang (2000)。其中，Wang and Swain (1995) 採用單一方程模型 (One-equation Model)，以最小平方法 (OLS) 估計 1978 年至 1992 年間匈牙利和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地主國 (host country) 的市場大小、資金成本、政治穩定性、匯率以及勞動成本都是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額的顯著因素。Zhang (2000) 則是透過相關需求模型 (relative-demand model) 解釋 1979 年至 1997 年間，中國吸引美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吸引美商和港商直接投資的因素並不相同：美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受接近市場所驅動，而港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則是為了達到出口的目的。

Liu et al. (1997)、Dees (1998)、Wei and Liu (2001)，以及 Hong and Chen (2001) 則由追蹤資料著手研究。Liu et al. (1997) 將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區分為合同的外商直接投資 (pledged FDI)，和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 (realized FDI) 兩種。其以隨機效果的追蹤資料模型，分析 1983 年至 1994 年間 22 個國家在中國的合作外商直接投資，以及 1984 年至 1994 年間 17 個國家在中國的合作外商直接投資。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雙邊貿易額、文化差異、相對市場大小的變化、工資率和匯率都是影響中國合作外商直接投資的顯著因素；而影響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顯著因素則為雙邊貿易額、工資率和匯率。

Dees (1998) 雖然也採用追蹤資料，但他卻使用誤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進行分析，得到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為市

場大小、相對工資和開放程度之結果。Wei and Liu (2001) 並以 Liu et al. (1997) 為依據，將資料更新至 1998 年，並在文中做更進一步的檢定。該後續研究的實證結果與先前研究的結果僅有些許的差異。此顯示無論對合同的或是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來說，雙邊貿易額和相對市場大小，都與外商直接投資成正向關係。而相對工資率、國家風險和文化差異等因素，則與外商直接投資成負向關係。

至於 Hong and Chen (2001) 在文章中，並用時間序列資料與追蹤資料，套用 Dunning 的折衷理論，來分析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其認為，跨國企業獨占的科技與管理經驗優勢，加上中國低廉的勞動成本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可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此外，運用中國內部的市場建立國際生產網絡的目標，也可能是重要的吸引因素之一。其餘的重要因素，還包括：人民幣的貶值、距離、文化和跨國企業全球性的佈局策略。

探討製造業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決定因素的文獻中，林智傑(2003) 以中國、美國及東協五國為例，利用經濟部統計處針對 2001 年所編製「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原始問卷資料，以實際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廠商為對象，分別進行台商主要三大投資區域選擇之 Logistic 迴歸分析；另外並比較實際影響不同廠商對外直接投資之區位選擇與投資傾向因素的異同。實證的結果發現，前往中國投資之廠商認為市場發展潛力大、土地取得容易、廉價充沛之勞工，以及投資國國內經營環境惡化是其前往投資之主要因素。此外，投資中國之廠商傾向生產消費財，且赴中國投資之廠商在台灣的事業研發密集度低。

有關台商赴大陸投資相關文獻中，翁鳳吟 (2005) 以 1997 年至 2003 年部分產業之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從廠商競爭優勢、公司治理制度及其他公司特性探討影響企業赴中國投資決策之決定性因素，並分析台灣

母公司投資後，兩岸三地母子公司貿易型態、價值鏈、公司內部治理特性與大陸子公司之財務績效之關聯性。分析結果顯示，廠商之研發密度愈低、廣告投入密度愈高、外銷比率愈高、市場佔有率愈高、成本結構愈高、董事會規模愈小、獨立董事席次比重愈高、廠商成長機會愈低、屬集團企業之一員以及為資訊電子產業之公司，赴中國投資之意願較高。

至於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投資，不論是投資金額或是投資地區的選擇，皆有如此大的差異。歐陽宏（2005）利用 24 個國家（地區）在 1993 年至 2003 年期間的資料，採固定效果模型研究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原因為何。結果顯示在 1993 年到 1996 年間，顯著的決定因素為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以及相對工資率。而在 1997 年到 2003 年間，顯著的變項轉變為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借貸成本、以及相對國家風險。此外，外商直接投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 1997 年到 2003 年間增加的速度有趨緩的現象。另外，由固定效果的分析中得知，地理距離與對中國的自發性直接投資具有負相關的關係。

表 3：世界各國投資中國之相關文獻

作者	研究對象及範圍	研究方法	重要結論
Wang and Swain (1995)	估計 1978 年至 1992 年間匈牙利和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	普通最小平方法	地主國的市場大小、資金成本、政治穩定性、匯率以及勞動成本都是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額的顯著因素。
Liu et al. (1997)	分析 1983 年至 1994 年間 22 個國家，以及 1984 年至 1994 年間 17 個國家在中國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資	隨機效果模型	雙邊貿易額、文化差異、相對市場大小的變化、工資率和匯率都是影響中國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的顯著因素；而影響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顯著因素則為雙邊貿易額、工資率和匯率。
Dees (1998)	1983 年至 1995 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誤差修正模型	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為市場大小、相對工資和開放程度之結果。
Zhang (2000)	1979 年至 1997 年間，中國吸引美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相關需求模型	美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受接近市場所驅動，而港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則是為了達到出口的目的。
Hong and Chen (2001)	1985 年至 1997 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時間序列資料與追蹤資料，套用的 Dunning 的折衷理論	跨國企業的科技與管理經驗優勢、中國低廉的勞動成本、巨大市場、運用中國內部市場建立國際生產網絡目標、人民幣貶值、距離、文化和跨國企業全球性佈局策略等為吸引外商赴中國投資的重要因素。
Wei and Liu (2001)	分析 1983 年至 1998 年間 22 個國家，以及 1984 年至 1998 年間 17 個國家在中國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資	隨機效果模型	雙邊貿易額和相對市場大小，都與外商直接投資成正向關係。而相對工資率、國家風險和文化差異等因素，則與外商直接投資成負向關係。
林智傑 (2003)	以中國、美國及東協五國為例，分析台商主要三大投資區域選擇	Logistic 迴歸分析	市場發展潛力、土地取得容易、廉價充沛之勞工，以及投資國內經營環境惡化是其前往中國投資之主要因素。投資中國之廠商傾向生產消費財，且赴中國投資之廠商在台灣的事業研發密集度低。
翁鳳吟 (2005)	1997 年至 2003 年部分產業之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	普通最小平方法	廠商之研發密度愈低、廣告投入密度愈高、外銷比率愈高、市場佔有率愈高、成本結構愈高、董事會規模愈小、獨立董事席次比重愈高、廠商成長機會愈低、屬集團企業之一員及為資訊電子產業之公司，赴中國投資之意願較高。
歐陽宏 (2005)	以 1993 年至 2003 年 24 個主要投資中國的國家為研究對象	固定效果模型	國內生產毛額、相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相對工資率、相對借貸成本、以及相對國家風險為影響赴中國投資與否的因素。地理距離與對中國的自發性直接投資具有負相關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文獻依年份排序順序。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係分析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之決定因素，並以北京、上海與廣東為例進行比較分析。因此，本章先回顧既有文獻，主要分為第一節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第二節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之相關文獻以及第三節世界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差異的決定因素之相關文獻三個部分，並分別加以歸納整理。

首先，在第一節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中，回顧了壟斷優勢理論、產品生命週期理論，以及投資發展階段理論等三個較常見而具代表性的理論。壟斷優勢理論認為，企業的壟斷優勢和國內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如果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市場運行是完全有效的，則國際直接投資就不能發展。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將產品生產劃分為導入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企業從事跨國直接投資活動是遵循產品生命週期的一個必然步驟。該理論對二次大戰後，西方已發展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給予了有效的解釋，也準確地描述了戰後跨國公司的一般投資過程。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則主張將一國的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能力與經濟發展程度結合起來，認為一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與每人平均 GNP 成正比關係。該理論動態地描述了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動態關係，也可以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過程。

其次，在第二節中對中國各地區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之相關文獻加以整理。主要包括 Head and Ries (1996)、Chen (1996)、Cheng and Kwan (2000)、Coughlin and Segev (2000)、Hsiao and Gastañaga (2001)、Sun et al. (2002)、Kuo and Huang (2003)、林俊儒 (2003)，以及陳哲正 (2003) 等比較中國區域間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文獻。實證結果多認為市場大小、基礎建設、優惠政策、勞工素質和政府效能跟外商直

接投資呈正向關係，不同於平均工資所呈現的負向關係。而且，也實證了中國東部沿海省分和中西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並不一致。

另外，由於探討世界各國對整個中國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是本文的重點，所以在本章第三節中對其相關實證文獻特別加以回顧。主要相關文獻包括 Wang and Swain(1995)、Liu et al.(1997)、Dees(1998)、Zhang(2000)、Hong and Chen(2001)、Wei and Liu(2001)、林智傑(2003)、翁鳳吟(2005)和歐陽宏(2005)。從以上的實證文獻可歸納出，投資國與地主國間相對市場大小、相對工資率、相對匯率、資金成本、政治穩定性和雙邊貿易大小，以及投資國國內投資環境惡化等，都曾被實證過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重要變數。